

白 滨 著

寻找被遗忘的王朝

(修订版)

中国边疆探索丛书

丛书主编 马大正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寻找被遗忘的王朝 / 白滨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4

(中国边疆探索丛书)

ISBN 978-7-5474-0023-4

I. 寻… II. 白… III. 中国—古代史—西夏(1038—
1227) IV. K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7078 号

责任编辑 傅光中 石学亮

装帧设计 王 钧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7.5 印张 52 幅图 158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引子

1962年隆冬。

这一年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这是我离开大学课堂进入科学圣殿的第二个冬季。那时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饥饿阴影已开始淡漠，处于冬眠状态的科研工作又有了复苏的迹象。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走上轨道后，所领导找我谈话，要分配我担任本所王静如教授的助手，意在征询我的意见。这对我来说不啻一闷棍。我毕业于1961年，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编制在紧缩，全国各大学分配到民族所的12名大学生有半数被另行分走了。由于我们是学习少数民族历史专业的第一批毕业生，又都有从事两年以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与史志编写工作的经历，所以还是被坚决留了下来。那年月，虽然物质条件匮乏，精神生活拘谨，但青年人还总是充满梦幻般的憧憬与理想。五年大学生活，特别是其中用两年的时间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实践，使一个太行山沟的儿子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1958年，我曾到南国海疆闽东畲家山寨，在苍山碧水白云深处和畲民共同生活，调查和参与完成了第一部畲族史志；1960年，当西藏平息叛乱的枪声甫停，我又



长途跋涉入藏。辽阔的藏北高原、美景如画的雅鲁藏布江河谷都印下了我的足迹。勤劳、淳朴的少数民族人民，丰厚神秘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入迷。我又迷恋上了保留有猎头习俗的云南佤族山佤族的历史文化。那时的抱负是做一个 20 世纪的摩尔根，终身扎根到云南边疆，为新中国的民族学作出贡献。所以，当我突然听到所领导分配我给王静如教授当助手时我犹豫了。

王静如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西夏学者，中国西夏学的开创者之一，本世纪 30 年代他的三部西夏学著作名世，获法国茹来奖，在国际西夏学界享有盛名。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西夏学的研究几乎销声匿迹了。这个时候，由于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一些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提到了议事日程。民族所有一批对古代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深有造诣的专家学者，如蒙古史学家翁独健，回鹘文专家冯家升，西夏语文学家王静如，辽金史学家陈述……帮助他们工作，向他们学习，继承他们的学问，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属下哲学社会科学部和民族研究所的一项重要工作。我被安排给王静如先生当助手，这是当时民族所一些青年人所艳羡的，而我因为正在做摩尔根的美梦，对领导上的决定就举棋不定。幸好当时还作为共青团员的我，最后只能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西夏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对我更是完全陌生的一门学问，时人所谓“冷门”，或誉之谓“绝学”。西夏本是中国历史上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西夏被元朝灭亡，元人修辽、金、宋三史时，独不肯给西夏王朝纂修同等的纪传体《正史》，导致西夏史料湮灭亡佚，百不存一。清代自乾、嘉以来崇尚考据之学，学者多由经学转向史学，尚属空白的西夏史园地，很自然地引人注目。他们着手给遗忘数百年之久的西夏历史进行复原补阙工作，开始撰著几部纪传体或纪事本末体的西夏史书。自载有西夏文字的碑刻和钱币被世人发现和识读后，特别是 20 世纪初西夏文字文献的大量发

现，中外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西夏语言文字的解读上，从而通过西夏人自己的著述文献，去认识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

接受助手工作后，我一开始整日捧读王静如先生成名作《西夏研究》三卷，同类似鬼符的西夏文字，和佶屈聱牙、不知所云的佛经打交道。王先生布置我帮他搜集和翻译俄国学者研究西夏学的资料，我才知道大量珍贵的西夏文献早被俄国人掠夺去，当今世界执西夏学牛耳者乃“苏联老大哥”。其时中苏两党交恶，剑拔弩张，论战不休，我始明白，我们的西夏学还包含着“反修”的政治内容呢。

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一段时间我被临时调到民族所下马的建筑工程地上新盖的猪舍担任猪倌。白天生炉火、挑水、剥红薯藤、熬猪食、清洗猪舍、喂猪，傍晚，安排猪们吃饱喝足安息后，我便在宿舍里作一番西夏神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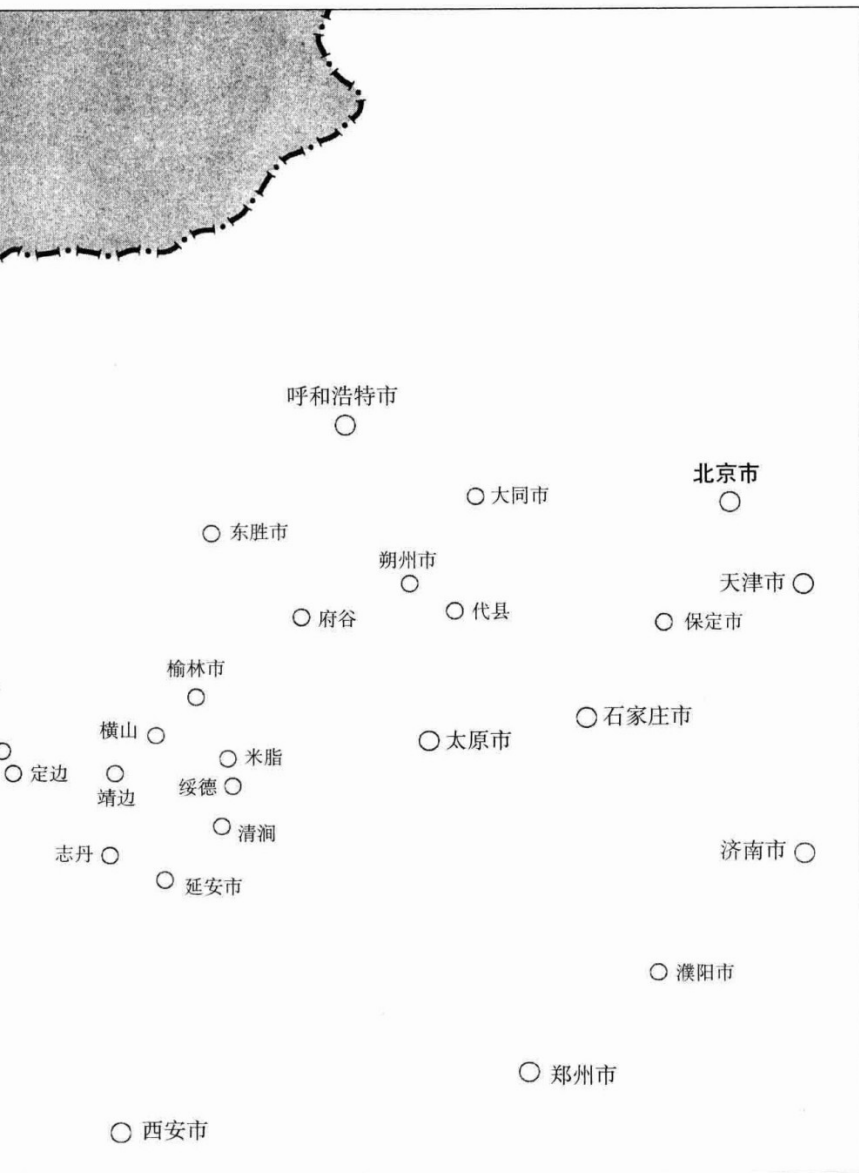
冬夜是漫长的，一到天黑西北风就毫无顾忌地肆虐起来，从楼旁的大操场翻卷起黄尘残叶，扑向窗棂，在窗台和桌子上积了层层尘土，让人心里发沉。才近9时，已听不见楼下锅炉房的马达轰鸣，暖气停火了，寒气袭来，这时就只能拥被坐在床上，借着高挂屋顶上昏暗的灯光，完成夜里的工作。

那一夜我边读边译几篇搜集到的俄文资料，一篇短文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是一篇刊登在1962年4月3日苏联《真理报》第四版上的报导，题目是：古代民族的新生；副题：列宁奖金应征著作介绍。文章简略介绍了沙俄著名探险家科兹洛夫率部于本世纪初到中国内蒙古的黑水城遗址发掘大量西夏时期珍贵文物文献情况，和苏联著名西夏学家聂历山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成果。聂历山的两册巨著《唐古特语文学》（研究和字典）被推荐为列宁奖金应征著作。聂历山在30年代初同王静如先生有过学术书信交往，1932年北京图书馆刊出《馆刊》西夏文专号，聂历山还寄赠苏联所藏西夏文献目录及其研究文章。据说聂历山未能善终，1938年被枪决了。60年代初介绍聂历



山的文章，谈他死时都回避了，或称“我们万分地惋惜卓越的苏联学者聂历山的不幸逝世”云云。1994年我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工作时，得知我的朋友列社托夫教授专门收集研究斯大林时代被处决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聂历山。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切，仅仅感到祖国珍贵的文化宝藏被外人掠夺了去，还要获得什么奖，这一点隐隐地刺痛了我，决计把西夏研究搞下去，长长中国人的志气，给“苏修”看，不也是“反修”的具体行动吗？何况当时所里大部分人下乡搞社教，大搞阶级斗争去了，跟着王静如先生搞西夏还是一处难找的避风港、防空洞呢！从此我踏上了到西夏王国遨游的航船，寻找着、探察着被人遗忘的古代王朝的秘密。





目 录

引子 1

一、敦煌三探 1

1. 到敦煌去 1
2. 金城秋韵 2
3. 夜入千佛洞 4
4. 初握画笔 7
5. 万佛峡探秘 10
6. 李仁章之死 13
7. 西千佛洞半日 16
8. 游月牙泉 18
9. 苦中寻乐 21
10. 敦煌守护神 23
11. 又到莫高窟 30

二、黑城一瞥 39

1. 圆了旧梦 39
2. 伫立城头 44
3. 黑城沧桑 51

三、俄邦二度 60

1. 黑城续梦 60



- 2. 籍海探珍 66
- 3. 在圣彼得堡的日子里 78

四、塞垣六记 88

- 1. 城址记 88
- 2. 寺庙记 105
- 3. 墓塔记 116
- 4. 碑刻记 128
- 5. 洞窟记 140
- 6. 收藏记 149

五、王朝遗梦 157

- 1. 众里寻它千百度 157
- 2. 西夏后裔应犹在 165

六、寻寻觅觅补新篇 175

- 1. 故地重游 175
- 2. 东渡扶桑 188
- 3. 从羌山到黄河边 194
- 4. 黑水城文献出土百年祭 206
- 5. 西夏学的喜与忧 216

主编手记 223

一、敦煌三探

1. 到敦煌去

活到现在我已经有三次造访敦煌的幸运，三次都是靠了西夏学术研究的缘分。

1964年的夏末秋初，正当中国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由国家干部组成的社教团纷纷开赴阶级斗争第一线时，我们的敦煌西夏学术考察组组成，一切筹备就绪，即刻登程了。

这在当时形势下也是一个奇迹。促成这次考察活动有多方原因。最重要的是当时民族所把它当作一项严肃的“反修”任务。我曾和王静如先生多次交谈过和苏联在西夏学领域中的竞争，王比喻为“打乒乓球”。那时正是中国的乒乓球健儿独霸世界乒坛的辉煌年月。我们缺乏西夏研究资料，当时曾计划派人到苏联的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去搜集资料从事研究，也因越来越紧张的中苏关系而成为画饼，倒是有消息说苏方打算派遣一位女西夏学者到民族所跟王先生学习。这时我们才想到了蕴藏西夏宗教、文化、艺术丰厚资料的敦煌及河西诸石窟群，那里有关西夏时期的情形还是不清晰和缺乏研究的。那一年我代表王静如先生多次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



先生和甘肃省文化局写信，商讨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窟群中的西夏、回鹘、蒙古时期的洞窟进行考察研究问题。此事也是敦煌文物所所希望的。此间，常书鸿每次到北京开会，王静如、我同王的另一位助手民族所语言室的应琳同志都同常书鸿谈过考察事宜。王静如又邀请了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考古教研室副主任的宿白先生参加。敦煌西夏调查组在民族所党委的领导下，由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利宾挂帅，本所的成员是王静如、我同王新招的研究生史金波等四人。8月26日，出发的前一天中午，王利宾找我去，他告诉我因哲学社会科学部给民族所布置了“特项任务”，他不能去敦煌了。我心里顿时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压力。王所长对我作了三点指示：在生活上照顾王静如先生，但要坚持原则；坚持财务制度，节约办事；严格资料制度。并嘱咐我按已起草的协议草案到兰州后同甘肃省文化局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和史金波先期于次日中午12点35分乘43次火车，离开北京奔向兰州。

2. 金城秋韵

我俩于8月29日上午8时30分抵兰州，3天后，王静如也飞抵兰州，至9月16日我们同乘火车赴敦煌。

兰州是我的旧游之地。1960年4月间我参加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进西藏时，也是首途兰州，在兰州作短期的准备与适应工作，住在七里河区附近的西藏驻兰州办事处。这一次又住在七里河区甘肃省博物馆对门的友谊宾馆。

兰州古称金城，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要冲，头枕皋兰，面临黄河，形势险要。从西汉时建县，经过了2000年的沧桑，曾经是西秦、前凉的国都。旧城市不大，分布在沿黄河南岸的峡谷中。1960年到

此时，旧城尚在，城市多矮屋土路，人口稀疏，街道狭窄，交通不便。当时新的建筑因国家经济困难多已“下马”。这一次来却处处有“大兴土木”的景象，市区交通比三年前有了改善，如从兰州火车站到七里河博物馆有了新开的1路无轨电车。（此后，1976年、1983年、1986年、1990年我又因西夏学术考察与研究工作多次到过兰州，一次次目睹兰州市的飞速变化，都有今非昔比之慨。）

在兰州的主要活动是：同甘肃省文化局、敦煌文物研究所商谈组成敦煌西夏调查工作组，并签订工作协议。9月2日晚8时，双方在友谊宾馆举行座谈会，甘肃方面参加的有省文化局局长霍仰山，群众文化科科长吴怡如，办公室彭岚峰，常书鸿。民族所有王静如、史金波同我。会谈结果是由我所3人、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敦煌研究所2至3人（后来有李承仙、万庚育、刘玉权、李贞伯参加调查组工作），省文化局派出省博物馆陈炳应共同组成调查组，由常书鸿所长负责领导。业务上由民族所负责历史与文字资料搜集研究，敦煌所负责洞窟壁画艺术摄影，共同研究西夏洞窟的确定与分期问题。会后起草协议，至9日正式签字。

这次在兰州期间还进行了召开座谈会、查阅文献等学术活动及参观和私人访问，如参观省博物馆、图书馆、西北民族学院、省民族研究所。9月6日上午，我们在省民族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民族研究所的金所长，陈树楠、屈大元主任，谢再善教授，西北民族学院的王沂暖教授等共二十余人。谢再善教授是著名的蒙古学家，名著《蒙古秘史》的中译者。王沂暖教授是著名的藏学家，《西藏王统记》等著作的译著者。会上双方谈到了有关藏族与西夏的研究。我们在北京时就听说屈大元先生了解甘肃所藏西夏文佛经之事，据屈介绍乃炳灵寺所出西夏文经，一部分今收藏在省博物馆，留下的一部分已不知下落。屈大元又说，大约是1932—1933年时，在甘肃高台与酒泉之间的一座寺庙中，住有从黑水城驮运石碱的骆驼队，在



驮夫用来包石碱的纸中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可见俄、英等探险家窃夺黑水城文献仍有遗留物，此事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遂有后来亲赴黑水城考察之举。

省博物馆何乐夫老先生，年已古稀，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待人热情，健谈风趣。他是浙江人氏，同王静如先生是清华研究院同学，抗日战争时到西北联大任教，居陇二十余年，已不愿离此。他要为王先生尽同学之谊，于9月5日在何老家又邀来正在兰州大学讲学的北京大学教授、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也是清华同学。清华三老相会自有一番热闹，席间妙语连珠，故事迭出。我们忝陪末座，也乐不可支。何老兴奋不已，用酒过量，颇有醉意。次日中午，常书鸿先生也派车接我们到他兰州的寓所。这是民主东路18号的一个僻静之处，俗称“一只船”，原为国民党要人张治中的公馆。建筑为西式洋房，屋内中央大厅周围墙壁上挂满了油画和国画，多人物与静物。屋内则显零乱不整，或疑此乃艺术家风度。得知常夫人李承仙常年居敦煌莫高窟，家中无人收拾料理。常先生亲办盛宴招待我们，王静如品尝后赞不绝口，称宴席为巴黎式的。

3. 夜入千佛洞

9月16日上午9时许，民族所一行三人和省博物馆陈炳应同乘西安经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西去敦煌。经过一天一夜约三十多个小时，于17日下午4时到柳园站，由此换乘去敦煌的汽车。柳园是兰新线上一大站，是西去新疆、青海，西南去西藏的交通要道。1960年进藏时，我为等候换乘去西藏的汽车，在此滞留三四日，那时所谓的镇，也只有几间低矮的土屋、工棚，一出屋门，四顾戈壁黄沙，一眼望不到边。这次来已见盖起了漂亮的车站和候车室。我们已先约好当日下午与常书鸿先生从敦煌来送智利画家时，我们搭

便车去敦煌，车站负责人知道我们是去敦煌的客人，派出人接待。5时许有常书鸿及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同的智利画家万徒勒里及夫人、女儿到此，他们换乘火车回北京，我们则分乘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吉普车前往敦煌。到千佛洞时已是黑天茫茫，不辨东西，感觉如夜航大海，忽然驶入一森森峡谷。我们住在下寺的“宾馆”中，一进的四合院式平房建筑。点上蜡烛，从窗孔向外望去，屋后月下古塔，崖障水流，树影婆婆，别有一番情趣。

夜入千佛洞的第一印象是十分美好的。常书鸿夫人李承仙热情接待和安排我们的食宿，她当时还兼任文物所党的书记，职责所负义不容辞。当我们端杯喝下莫高窟的第一口水时，感觉就不是那么浪漫了，苦涩难咽，据说初喝之人还要闹肚子。敦煌所为照顾来莫高窟参观的领导、专家，有专门用汽车从敦煌运来的甜水喝，王静如即属于照顾之列，而我们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初来的几天因等待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承仙同志和刘玉权同志陪同我们参观石窟、陈列室，熟悉文物所所藏资料，特别是与西夏洞窟有关的文物资料。9月20日，李承仙接到宿白的电话，得知他将在22日乘193次车到柳园站，要我即刻去柳园接他。当日上午12时，我搭敦煌文物所的大卡车到敦煌县城，当晚在县委招待所过夜。这天正逢中秋佳节，碧空蓝天，皓月当空，我独步古城敦煌，关门的店铺与闭户的居民住宅中都弥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电影院门口张贴着放映匈牙利反特故事片《地下殖民地》的宣传画。我为消磨时间竟购票入场，场内乱哄哄的，坐等了一个小时才开始发电，在百无聊赖中信步出来，在影院门口喝了碗醪糟，买几个月饼和梨，回到招待所自吃一番，算是过节。

怕误了明晨7时去柳园的班车，县招待所无人值班，我又没有手表，所以一夜未睡好，大约四五时就到了汽车站，直等到7点开车挤在车门口的位子上，在饥寒交迫、精神恍惚中车到柳园，已近



敦煌莫高窟九层楼下（1964年冬，左起刘玉权、白滨、王静如、史金波、李贞伯）

中午时分。下车找好旅馆，是镇上一排土屋中的一间，内设木板床三张，别无他物。下午去汽车站购明日返敦煌的票，但见车站上已住满了穿绿色军装的新兵，小伙子个个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他们排队打饭，席地用餐，饭后有的挑水，有的唱歌，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听说他们是建设兵团的。次晨6点45分进火车站接到宿白先生，到旅馆休息，我抄写他带来的1951年在莫高窟考察时关于宋、西夏洞窟编号的笔记。饭后我又向甘肃省文化局发电报，请示我们打算去榆林窟考察的事。因为榆林窟属安西县管辖，到那里还要请省里另开介绍信。接着又把宿白已到的消息打电话告诉在敦煌县城